

# 刑事诉讼法第 291 条“需要及时审判”的界定与适用研究——以恐怖活动案件为视角

伍世伟

甘肃政法大学, 甘肃兰州, 730000;

**摘要:** 201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增设缺席审判制度, 将恐怖活动案件纳入适用范围, 并以“需要及时审判”作为限定条件。然而, 该条款的语义模糊性导致司法中存在认定标准不统一、适用范围不当扩大等问题。本文以恐怖活动案件为研究视角, 系统探讨“需要及时审判”的界定标准与适用路径, 指出其核心价值冲突体现为公正与效率的博弈及权利保障与打击犯罪的动态平衡; 进而结合恐怖活动案件的极端危害性、证据隐蔽性、跨国性等诉讼特殊性, 论证缺席审判在反恐领域的适配性, 提出“需要及时审判”的界定需遵循必要性、比例性、个案审查与权利保障原则, 构建“三要件+四因素”综合裁量模型, 并明确证据已固定、社会风险消除等四类排除情形, 以防止制度滥用。

**关键词:** 缺席审判; 需要及时审判; 恐怖活动案件; 界定标准

**DOI:** 10. 64216/3080-1486. 25. 09. 075

## 1 问题的提出

2018 年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增设缺席审判制度, 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案件纳入适用范围, 其中第 291 条明确规定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案件适用缺席审判需满足“需要及时审判”的条件。同时, 立法机关认为“贪污贿赂犯罪之外的其他案件, 还是应当严格限制范围并规定严格的核准程序, 根据国内国际大局和个案实际情况灵活掌握, 稳妥实施”。这既回应了打击犯罪、维护国家安全的迫切需求, 也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审慎态度。

然而, “需要及时审判”作为概括性条款, 其语义边界模糊、认定标准缺失, 导致恐怖活动案件适用缺席审判中存在诸多困境: 一方面, 标准欠缺将导致不同地区司法机关对“及时审判必要性”的理解存在差异, 部分案件可能出现以“社会影响重大”替代“及时审判需求”的扩张化倾向; 另一方面, 恐怖活动案件的特殊性使得传统对席审判原则的例外适用缺乏可操作的判断标尺, 既存在因标准严苛导致打击犯罪不力的风险, 也面临程序正当性质疑的理论挑战。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缺席审判制度的正当性, 更直接影响缺席审判程序的规范化运行。十分有必要对“需要及时审判”进行的科学界定, 以期填补特殊程序启动要件研究空白, 为缺席审判法理基础提供精细化框架; 同时规范司法权运行, 在保障权利前提下实现反恐目标, 为处理逃匿型恐怖案件

提供指引。

## 2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理论基础与反恐适配性

### 2.1 缺席审判制度的价值平衡机制

刑事诉讼程序的演进始终伴随着价值选择的艰难博弈, 缺席审判制度的诞生正是这种博弈的典型体现。传统刑事司法以对席审判为原则, 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控辩双方的当庭质证、辩论形成裁判基础, 确保被告人充分行使防御权。缺席审判作为例外程序, 打破了传统诉讼结构的平衡, 在效率价值与犯罪控制目标的双重驱动下, 构建起一种“以权利克减换取程序推进”的特殊机制。恐怖活动案件的特殊性进一步放大了这种价值冲突的复杂性, 其犯罪行为不仅侵害个体法益, 更直接威胁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证据的时效性、风险的扩散性要求诉讼程序具备快速响应能力。恐怖活动案件适用缺席审判程序的规则有三个特点: 适用对象的限定性、启动条件的限定性和审核程序的限定性。这都说明, 恐怖活动案件缺席审判的适用成为平衡多重利益的制度选择: 一方面, 通过及时审判剥夺逃匿恐怖分子的非法利益(如犯罪所得), 削弱其继续实施危害行为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 借助司法裁判的宣示功能, 强化公众对反恐斗争的法律认同。这种平衡并非静态妥协, 而是要求司法机关在个案中精准把握权利克减的限度, 确保被告人核心防御权(如委托辩护、知悉指控内容)不因缺席而实质丧失。

## 2.2 恐怖活动案件的诉讼特殊性

恐怖活动案件具有极端危害性与风险扩散性、组织隐蔽性与证据收集困难性、跨国性与管辖复杂性、和意识形态驱动性与刑罚预防需求，的诉讼进程呈现显著异于普通刑事案件的特殊样态。其极端危害性要求诉讼程序具备更强的应急响应能力。此类犯罪通常以大规模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目标，社会恐慌效应的持续扩散对程序效率提出刚性要求。证据体系的隐蔽性特征尤为突出，犯罪组织多采用加密通讯、秘密据点等方式实施行为，电子证据易被远程销毁，实物证据的收集往往依赖跨国协作。跨国性特征则加剧了管辖权冲突与证据调取难度，部分案件涉及多国犯罪嫌疑人或跨境资金流动，传统司法协助机制的滞后性难以满足及时追责需求。意识形态驱动性使犯罪嫌疑人更易形成对抗性心理，即使归案也可能通过拒绝供述、利用诉讼程序拖延等方式阻碍审判，传统诉讼模式在破解此类策略时往往力不从心。这些特殊性共同构成对传统诉讼程序的严峻挑战，暴露其在证据固定、程序推进、跨境协作等方面的局限性。

## 2.3 缺席审判适用于反恐案件的正当性边界

缺席审判在恐怖活动案件中的适用必须严守三重正当性边界。国家安全需求构成首要正当性基础，当恐怖组织的持续活动对社会稳定构成现实威胁时，及时的司法追责有助于瓦解组织架构、消除安全隐患。谦抑性原则要求该制度仅作为最后手段启用，必须在穷尽国际引渡、劝返等常规措施无效后，且不存在更轻缓的替代方案时方可适用。权利救济机制的完善程度直接决定正当性强度，包括庭前证据开示、律师独立辩护、归案后重审请求权等，需形成完整的权利保障链条。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协同作用不可忽视，通过与联合国反恐公约框架对接、建立双边证据交换机制，可增强缺席判决的国际认可度与执行效力。三重制约机制共同构成正当性边界：必要性审查过滤非核心案件，权利保障确保程序底线，国际协作提升裁判实效，三者缺一不可。

## 3 “需要及时审判”的界定基本原则

### 3.1 必要性原则：以不可挽回损害为核心标准

必要性原则构成“需要及时审判”认定的基础性准则，其核心判断标准在于案件是否存在证据不可逆破坏或社会安全风险持续扩散的现实危险。证据紧迫性主要体现在两类情形：一是关键电子数据存储介质面临远程删除风险，如恐怖组织加密通讯记录、跨境资金流痕迹等易逝性证据；二是实物证据因自然环境变化或人为干预可能永久灭失，包括制造爆炸物的化学原料、临时藏匿点的生物痕迹等。社会安全风险的持续性则表现为犯罪嫌疑人逃匿期间仍通过加密网络指挥恐怖活动，或

其意识形态持续通过暗网平台扩散，对潜在极端分子形成实质煽动。适用该原则需严格遵循替代性措施穷尽要求，只有在国际红色通缉、引渡请求被明确拒绝、劝返工作陷入僵局等常规手段均告失败后，方可启动缺席审判评估。司法实践中需建立“损害紧迫性-措施不可替代性”的双重验证体系，通过证据保全紧迫性评估报告与反恐情报部门风险评级，形成客观化的必要性判断依据。

### 3.2 比例原则：措施强度与案件危害性的匹配

比例原则要求缺席审判措施强度必须与恐怖活动案件的社会危害性形成精准匹配，其审查逻辑包含适当性、必要性与均衡性三重递进式判断。适当性审查聚焦措施与目标的契合度，即缺席审判是否有助于实现证据固定、风险防控等反恐目标；必要性审查要求在多种可选措施中选择对被告人权利限制最小的方案，例如对低层级涉案人员可优先采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均衡性审查则需评估审判效率提升与权利克减程度是否成比例，避免为追求打击速度过度牺牲程序正义。不同层级恐怖活动案件应适用梯度化规则：对于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的暴力恐怖案件，可适当放宽缺席审判启动条件；针对意识形态传播类案件，则需强化权利保障措施；而预备阶段恐怖活动案件原则上排除缺席适用。这种差异化适用机制既确保打击力度与危害程度相适应，又通过动态调整实现个案正义。

### 3.3 个案审查与权利保障的协同适用

“需要及时审判”的认定需构建严密的个案审查机制，建议采用“三级审查模式”实现权力制衡：首先由承办检察官结合反恐部门风险评估出具初步审查意见，重点核查证据紧迫性与逃亡状态的真实性；其次提交由刑事诉讼法专家、反恐情报分析师、国际司法协助专员组成的专业小组进行实质论证，对案件是否符合必要性与比例原则形成独立评估报告；最终由检察长办公会集体讨论决定，必要时可提请同级政法委组织跨部门会商。权利保障构成制约个案审查的关键因素，律师强制代理制度需贯穿审查全程——检察机关在启动审查前应指定具有反恐案件辩护经验的律师，该律师需独立核查逃亡事实、阅卷并就权利保障措施提出书面意见。审查过程应建立“权利影响评估”制度，对被告人知情权、质证权的克减程度进行量化分析，确保任何程序推进均保留基本权利救济通道，形成“审查严密化-权利实质化”的良性互动格局。

## 4 “需要及时审判”的界定要素与裁量模型

### 4.1 核心要件的三维构造：证据-风险-逃亡

“需要及时审判”的认定需建立证据紧迫性、社会

安全风险持续性、逃亡状态不可逆性的三维要件体系，三者构成缺一不可的逻辑闭环。证据紧迫性表现为关键证据面临灭失或永久损坏的现实危险，具体判断指标包括：恐怖活动策划的电子痕迹（如加密通讯记录、暗网交易数据）的自动删除时限，制造爆炸物原料的化学性质衰变周期，以及关键证人因人身安全威胁可能拒绝作证的风险等级。社会安全风险的持续性聚焦于犯罪嫌疑人逃匿状态对国家安全动态威胁，典型情形包括其通过加密通讯渠道持续指挥恐怖组织活动，或利用境外媒体平台传播极端思想引发模仿性攻击。逃亡状态不可逆性则取决于国际法层面的追缉障碍，如犯罪嫌疑人藏匿于未与我国签订引渡条约的国家，或所在国法律明确禁止向反恐案件提供司法协助，导致常规追逃措施陷入实质性僵局。三要件的满足同时构成缺席审判启动的刚性门槛，任一要件缺失即应排除适用——即使证据面临紧迫风险，若犯罪嫌疑人已丧失行动能力且无再犯可能，仍需优先考虑对席审判；反之，单纯的长期逃匿状态不足以启动缺席程序，必须叠加证据灭失与安全威胁的双重紧迫性。

#### 4.2 “三要件+四因素”综合裁量模型构建

综合裁量模型采用“要件前置筛选→因素加权计算→阈值判定”的三阶分析框架，在三维要件达标的基础上引入四组裁量因素进行量化评估。具体评估举例如下。犯罪情节严重程度按伤亡后果、经济损失、社会恐慌指数设置三级权重：造成百人以上伤亡的案件赋予30%权重，形成恐怖活动资金链核心节点的案件赋予25%权重，仅涉及预备行为的案件权重下调至10%。国际影响因素考察案件对我国外交关系、国际反恐合作的潜在冲击，被联合国安理会列名的恐怖组织关联案件可获得20%加分，而可能引发跨境人权争议的案件需扣减15%分值。证据稳定性评估聚焦物证链完整度与言词证据可信度，DNA鉴定、电子数据固化等客观证据占比超60%的案件赋予25%权重，主要依赖污点证人证言的案件权重限制在10%以内。权利保障可能性则根据律师代理可行性、境外证据核查难度设置反向权重，能确保被告人近亲属收到完整诉讼文书且指定辩护律师完成阅卷的案件保留20%分值，存在送达障碍或辩护权实质受限的案件该项权重归零。四因素加权总和达到60分阈值（总分100分）时，方可认定符合“需要及时审判”标准。模型运行中需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每季度根据最高法指导案例更新权重系数，确保裁量结果与反恐形势变化保持同步。

#### 4.3 明确“需要及时审判”适用排除情形：防止制度滥用的边界

为防止司法恣意，还应当明确“需要及时审判”适用排除情形。一是证据已固定。若证据通过区块链存证、证人保护计划或跨国协作已有效固定，无灭失风险，则无需紧急审判。二是社会风险消除。若恐怖组织已被摧毁（如核心成员全部落网）、公众恐慌已平息（如舆情热度降至正常水平），则失去及时审判的必要性。例如，恐怖组织头目被击毙，相关话题阅读量降至一定数量以下。三是逃亡状态可逆。若被告人有回国意愿（如通过家属传递消息）或引渡程序正在推进（如对方已受理引渡申请），则可等待被告人归案后适用对席审判。四是权利保障无法实现。若被告人无法获得辩护（如无律师愿意代理）或无法知悉指控内容（如未送达起诉书副本），则违背程序公正原则，不得适用缺席审判。总而言之，综合裁量模型的逻辑关系为：核心要件是前提，裁量因素是补充。只有同时满足三个核心要件，才能进入裁量环节；裁量因素用于判断“及时审判”的必要性程度，最终决定是否适用缺席审判。

#### 5 结语

“三维要件+四因素”裁量模型的构建为破解“需要及时审判”条款的适用困境提供了系统化解决方案。理论层面，该模型通过证据紧迫性、风险持续性、逃亡不可逆性的刚性要件设置，将抽象立法原则转化为可操作的判断标准，填补了传统价值平衡理论在具体适用层面的空白；实践层面，加权评分机制与动态调整规则的引入，既为司法机关提供明确裁量指引，又通过量化分析压缩自由裁量空间，有效遏制制度泛化风险。这种结构化认定路径既延续了立法机关对缺席审判的审慎立场，又为反恐特殊需求提供了规范化的程序出口，实现了“打击犯罪”与“权利保障”的双重价值兼容。建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指导意见，对“证据紧迫性”中的电子数据保存时限、“社会风险持续性”的情报评估标准等核心概念作出列举式规定；同时制定《恐怖活动案件缺席审判量化评估指引》，明确四因素的具体评分细则与阈值调整程序。

#### 参考文献

- [1] 喻海松. 刑事缺席审判程序的立法进程[J]. 法律适用, 2018(23): 41.
- [2] 周楠. 试论恐怖活动案件缺席审判的适用原则与运行规则[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1): 91-92.

本文为2022年度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特色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研究”（2022QN024）阶段性研究成果。